

·学人书讯·

# 关于文子其人其书的探索

## ——兼论《文子》成书及其思想》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6-0135-05

《文子》一书,二十多年以前在道教经典中和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可以说—在九天之上,—在九地之下。至1973年定州西汉墓出土了《文子》残本,它作为思想史的著作才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子》从魏晋时代起,一直受到道教学者的重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置崇玄学,规定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新唐书·选举志》),其学问成了选拔人才的科目。天宝元年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改《文子》为《通玄真经》,名列《道德真经》、《南华真经》之后,为道教的第三大经典,因而此后出现了不少注本。但是在道教之外《文子》一书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这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文子》书目下注的“似依托者也”一句话不无关系,但也同今本《文子》一书的复杂情况有关。以往学者们一方面由于见到的资料有限,一方面由于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对《文子》一书一些问题的处理显然是简单化了。

论及《文子》,不可避免地先要说到文子其人,事实上人们在《文子》一书真假的判断中,也都无形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文子》九篇“下,班固自注:

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在很多人看来,如《文子》是文子所著,文子又是老子弟子,或是周平王时人,便可认为其书是“真”;如《文子》虽先秦时书,但非文子所著,则是“依托”,而过去等同于伪;如作者虽先秦时人但或非老子弟子,或非周平王时人,也算依托。所以,我们在谈《文子》此书之前,先说说文子其人。

《文子》书中提到的“平王”,其前并无“周”字。班固注说

是“称周平王问”,则他理解书中“平王”为周平王。按理,如周平王时无文子其人,则不可能有依托周平王之事,所以班固于《汉书·古今人表》的“中”中“秦襄公之后列有文子”,时代大体与周平王相应。不过班固也认为这个文子未必同《文子》一书有什么关系;他认为《文子》一书有关的人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所以他说:“似依托者也。”学者们未能深思,以为班固在《汉书》中的表述自相矛盾。其实班固在没有更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采用了疑以传疑的办法,态度是谨慎的。

尽管大部分人误解班固的话,以人及书,多以《文子》为伪书,但也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云:“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周平王时人,非也。”楚平王(前528—前516年在位)同老子(前580—前500年)大体同时,而较孔子(前551—前479年)稍早,如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中年纪大者,则其说也不是没有成立之可能。故孙星衍便主张此说。孙星衍《文子序》一文就《汉书·艺文志》中的班固注做了解释:“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又云:“书称平王,并无‘周’字,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上引前数语是解释班固注并说明后人对班固注的误解,完全正确。上引后数语是对班固以《文子》一书中的“平王”为“周平王”提出看法。自1973年河北省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文子》残简,不少学者倾向于这个看法,以为书中平王为楚平王。但也有学者据蒙文通先生之说,以为《文子》中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中华书局,1996,7。

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北方的道家不反对仁义,南方的道家反对仁义。在这一根本差别下就处处有殊异了。《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7月。

收稿日期:2006-02-27;责任编辑:党燕妮

表现的是北方道家思想，不同于楚国流行的南方道家思想，文子应为北方学者，不当在楚，不同意“楚平王”之说。我以为蒙文通先生所言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情况，战国中期庄周一派更加突出了老子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文化的批判，否定仁义，而北方的道家则有不少地方同儒家思想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春秋战国之间尚无此种分化。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郭店楚简本作“绝伪弃虑”，就说明这一点。所以，《文子》中“平王”为楚平王，同《汉书·艺文志》言文子为“老子弟子”之说，也并不矛盾。这里确实存在着探索文子其人的空间。

北魏李邕《文子注》解释说：“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引）。此说在时代上同“老子弟子”之说完全符合。但据钱穆考证：“计然”乃范蠡所著书名，意思为谋事之然者，也即谋行事成功之书。钱氏列十事以证之，确凿可信。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证据：《国语·吴语》中言“越王勾践乃召其五大夫”，以下大夫舌庸、大夫苦成、大夫种、大夫蠡、大夫皋如皆有进言，独无所谓计然。学者们主计然为人名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史记·货殖列传》“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一句。而从上面的事实看，“计然”显然为书名。班固误《史记》，以计然为人名，列于《古今人表》，《吴越春秋》也因而加以敷衍，其后韦昭、徐广及《史记集解》、《史记索隐》陈陈相因，皆以计然为人名。若果真《史记》中“计然”为人名，越王勾践召其大夫，首先应是计然，而事实上却没有。同时，《国语》、《左传》中也不见“计然”之名，则“计然”本为书名，无可怀疑。李邕是依据了后人所编《范子》中的文字，其书在整理中掺杂进后来的材料，也是常见之事。《范子》中的“葵丘濮上人”及其先晋亡公子也”之语，也应是牵附了其他的人事。而李善竟信其说（《文选·曹子建求通亲亲表》注），孙星衍也以为“文子即计然无疑”，应该说是通人之蔽。

但所谓“范蠡之师”的说法也不是完全向壁虚造。我怀疑这个传说的形成同文种有关。《国语·越语下》载范蠡对越

王勾践语：“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之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这里所谈文种的思想特征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的“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的道家思想颇为一致。《国语·越语上》又载文种谏越王的一段话，其中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这同《论六家要旨》中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家思想也一致。当夫差起师伐越之时越王勾践将起兵迎战，而文种言“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云云，劝越王先求行成，以柔弱下之，最后胜越，这也正是《老子》和简本《文子》所主张的虚静、柔后的思想。过去有的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早期道家并不是不言兵。所以，清人江瓛《读子卮言》提出文子即文种之说。以文子为文种，时代上同“与孔子并时”之说相合，姓氏相投，思想上也比较接近。

当然也还有一个问题，即简本《文子》中两次说到的“天王”。这是我们《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的证据。但吴王夫差也被越国使臣称之为“天王”，而这使臣正是文种同越王合计之后，越王听文种之言而派去的，如果说这使臣是受了文种的指教，亦无可。陆机《豪士赋》云：“文子怀忠敬而齿剑。”李善注引《史记》和《吴越春秋》文，以为即指文种，按之史事应该无误。《抱朴子外篇·知止》：“文子以九术霸越”，则“文子”指文种甚明。所以，我以为前人《文子》作者为范蠡师，应是由文种误传而成。

以上只是要说明《文子》中平王为楚平王”说，“文子即计然说”、“文子即文种说”之产生都有着文献上、传说上和有的人思想与《文子》相近等等的原因。我们研讨古代文献，应对古人抱着一个理解的态度，不要认为古代有很多人专门作伪，造作谎言。我这样说并不等于稀泥抹光墙，不论正误，不分是非。我只是说：只有抱着这种理解古人的态度才能对有些问题作出公正的客观的判断。比如“文子就是文种”说，由上面所论可以看出，理由是比较充分的。但我觉得

实际老子一生也生活在北方。老子为春秋时陈国相人。《老子铭》曰：“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赖乡也即今本《史记》所说厉乡，其他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与安徽省亳州市之间。如就相（县邑）而言，春秋时属宋，如就具体之赖乡曲仁里而言，则春秋时属陈。但无论属宋、属陈，战国时都归入楚国，故今本《史记·老子列传》说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老子列传》言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言为“周之征藏史”，《礼记·曾子问》“吾闻诸老聃曰”下孔颖达《疏》云：“为周柱下史，或为守藏史。”《史记·张苍传》司马贞《索隐》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上古之史”，多指图籍，则“守藏史”、“守藏室之史”、“征藏史”、“柱下史”意思相同，指同一官职。则老子一生也只在洛邑的东周王朝任过此一职。又据《庄子》的《天道》、《寓言》两篇，老子免官后居于沛。《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杜预注：“沛，泽名。”《公羊传·僖公四年》载齐军“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则其地近于齐。则老子一生生活于北方，不曾至楚，后来齐地之道家不排斥仁义，实同老子本来之思想一致。老子之时道家思想亦尚未形成分化。）

还是有问题。因为楚平王死的一弔(前516年)下距吴亡(前473年)43年。吴亡之后勾践尚不放心文种,令其自裁,则吴亡之时文种年岁不会超过六十五岁。那么,楚平王卒之年,文种年岁不会超过二十二岁。这同书中平王恭敬请问的身份不符。故虽然《越绝书》卷六言文种在楚为大夫,《史记正义》引《吴越春秋》佚文言“大夫种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但我还是以《文子》一书所记乃文种在入越之前同楚平王的对话,差不多没有可能;如真的是文种,则是入越之后借着同楚平王的对话,而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见解,并非纪实之言。

今人李定生先生大约也是因为楚平王时代稍早之故,提出齐平公(前480—前456年在位)之说。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列大量证据说明“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则齐平公在其境内可以称王。唯齐平公之时姜齐政衰,田氏专权,“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平公是否还有可能同有的文人从容讨论有道无道、治国为政,谈什么“帝王之功成矣”(0929简),论什么“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废,传之后嗣”(0892简);“人民和陆(睦),长有其国”(2218简)。李定生先生引《韩非子·内储说上》“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就其思想和反映出的身份来说,应同作为思想家的文子一致,而不符合田文(孟尝君)的口吻,此文子非田文,可以肯定。但那齐王是否是齐平公,就难说。当然,这仍然可以作为继续探索的一个线索。

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别录》云:“今案《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但《文子》一书的思想既不同于子夏一派的注重《诗》《书》典籍,也没有墨家的思想特征,同时今本《墨子》中并无“文子”其人。我以为《别录》中这个“文子”乃是“禽子”字坏而误(“禽”字当中含有“文”字,字残损成“文”字)。墨子弟子禽滑釐又称“禽子”,见《墨子·所染》。《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正与《别录》佚文中所谓“文子”的情形相合。所以此条材料难以依

据。

归结起来,我以为历史上的文子其人,是存在的,关于他的具体生平、身份等仍然需要从班固疑以传疑所提供的两条信息中去找:一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二为周平王时代。

我猜想:文子应是周天子的同姓,以文为氏,因其疏远,而以文史典籍为务。《通志·氏族四》:“文氏,姬姓。《风俗通》云:‘文氏,周文王支孙,以谥为氏。越大夫文种。’”言文氏为文王之后,无线索可录,未必可靠。但其为姬姓,应非虚造。晋为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故《范子》中言文子“其先晋亡公子也”,应非完全无据。那么文子以同姓贵族的身份同周平王对话,是有可能的。

但话说回来,《文子》一书,却肯定既非周平王时人所著,也非春秋战国之间人所完成。因为简本《文子》中反应出的关于“道”、“仁”、“仁义”等哲学与伦理方面的概念都是春秋末年才形成的。

事实上,《文子》一书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就原本《文子》而言,其中应包含有一些春秋战国之间的材料,而主要为战国晚期的东西。至魏晋之时由于长期战乱,典籍散佚,而道教又得到大的发展,道教学者出于道教经典建设的目的,在道家著作《文子》残本的基础上抄录《淮南子》等书加以补充,使之成为综合了汉代以前南北道家思想的一部重要道教经典。从北魏末年(约当南朝的齐梁时代)至唐贞观年间又进一步完成了形式上的改造和名称的变化,成为所谓《通玄真经》。我以为作为诸子之作的《文子》应以简本为主,参之以今本《文子》中除去与《淮南子》相重文字的部分,而作为道教的经典可以今本《文子》即《通玄真经》为主。不必因为前者而否定后者,也不必因为后者而贬低前者。

王利器先生的《文子疏义》已列入《新编诸子集成》之中。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将以前被判为伪书的《文子》、《尉繚子》、《六韬》、《鬼谷子》、《尸子》、《鹖冠子》等排除在外。由近二三十年出土地下文献看,这些书并非伪书。将它们列入《新编诸子集成》,可以扩大先秦诸子研究的范围,增加中国哲学、政治、经济、美学等研究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王先生在杜道坚《文子》、《道德》之疏义“之说的基础上,提出《淮南》、《文子》之疏义也”的观点,不仅

《观堂别集》卷一,见《王国维遗书》第三册。李定生先生未列出这一点作为论据。

文王之子十人被封和后嗣延续情况,《绎史》卷二十一《周建诸侯》有考述,可以参看,且周代国君之子不能以国君之谥号为氏;其继位者皆以王族之氏为氏,另封者至下一代始以另封之始封君之封地或谥号为氏。

魏启鹏《文子学术探微》一文认为“文子乃周平王时太史辛甲之后,辛氏世为周史,辛有次子迁于晋,即为晋之董史”。但无论以“辛”为氏还是以“董”为氏,其书都不当称为“文子”,故其说似难成立。

不区分简本、今本的不同，也将从原本到今本很长时间中形成的种种复杂现象隐蔽起来。

李定生、徐慧君二位于1988年出版了《文子要诠》，很快销售告罄，反映了学者们希望以科学的态度重新看待、研究这部书的企盼与迫切心情。2004年又出版了他们在前一书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文子校释》，书前有在此前发表论文基础上写的《论文子》作为代前言，书末且附了《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正文中对篇章中的人称，也据简本《文子》作了校改。应该说这是《文子》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李定生先生在文子其人其书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或具有启发性的看法，对今本《文子》的思想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但李定生先生同样忽视了《文子》这部书从魏晋至初唐三百多年中在内容上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不分原本和今本，笼统地认为《文子》是先于《淮南子》的先秦古籍，将二书多处相同的现象归结为“是《淮南子》抄袭《文子》”。

另外，由于简本《文子》的发现，也有对今本《文子》的价值忽视和贬低的倾向。我们认为今本《文子》是道教早期理论建设中的重要论著。原本《文子》的散佚是诸子书的一大损失，但从道教的方面来说，经过增补，吸纳了《淮南子》的一些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老子》一书的道论，所以成了地位仅次于《道德经》《南华经》的重要经典。前些年见到某出版社出版的《道学十三经》，包括《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老子想尔注》《老子中经》《黄庭经》《太平经》《玉皇经》《黄帝阴符经》《清静经》《悟真篇》。选至宋代，而不及《通玄真经》，令人不能理解。作为道教的元典，《通玄真经》是应该收入的。另外，《洞灵真经》《庚桑子》虽杂取《庄》《列》《老》、《文》《商》及《吕氏春秋》《说苑》《新序》诸书，但颇有理致，亦不当废。而从道教文化的方面说，《老子中经》《珠宫玉历》《玉皇经》绝不能同它们相比。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道学精华》选道学重要著作28种，也没有《文子》《庚桑子》又作《亢仓子》，同样反映着认识上的偏颇。

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文子》这部书仍有必要再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葛刚岩同志在我处攻读博士学位，他研读了简本《文子》和今本《文子》后，对这部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鼓励他就这个充满了问题的课题作一努力，于是确定为他的学位论文选题。他不但对这个选题充满了热情，而且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自《文物》杂志1995年12期公布了定州出土的汉简《文子》以来，不少学养深厚的学者都关注它，并发表

了论文，各家都讲得有道理，但总体上又存在很多矛盾。

从对这部书的价值的高度重视方面说，我们同王利器先生、李定生先生等很多学界的朋友们是一样的。我对葛刚岩同志说：

“不要希望彻底地解决问题，只要认真地分析简本、今本反映出的一些现象，实事求是，弄清一些基本事实，就是成绩。”葛刚岩同志为此课题几个假期没有回家，研读有关文献和十年来学者们的论著，他采取多学科结合的办法，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常因此而废寝忘食。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终于于2004年春完成了学位论文《文子成书及其思想》。论文对文子其人尤其是《文子》一书中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前修时贤的基础上，宏观把握，清理材料，择善而从，合理推论，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无论从思想史还是从宗教学的角度看，都是有意义的。

综观葛刚岩同志这部书，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对前修时贤之说，都给以广泛的关注并进行认真的研读，但其依违去取，概以简本《文子》和今本《文子》所反映出的事实为准。比如，究竟是《文子》抄了《淮南子》，还是《淮南子》抄了《文子》，这两种看法都有些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很有声望的学者支持。王应麟言《文子》之言“其见于《列》《庄》《淮南》者不可缕数”（《困学纪闻》卷十）；王念孙《读书杂志》举三例以明《淮南子》误读《文子》原文，或易字，或增字，皆失其本义；孙星衍举例以证《淮南子》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迭出（《问字堂集·文子序》）；今人王利器先生的煌煌大著《文子疏义》三十余万字，其目的即在就《淮南》之括、衍、纒《文子》为言者，句疏字栞而比义之（《文子疏义序》）；李定生、徐慧君二位《文子校释》之代前言又从几个方面来论证《淮南子》抄《文子》之事实。而主张《文子》抄《淮南子》者自柳宗元《辩文子》提出“驳书”说之后，有不少人实证以证《文子》抄《淮南子》。清钱熙祚以《文子》与《淮南子》互校，言“乃知此书之误，误于作伪者半，误于传写者亦半”。“《文子》出《淮南子》十之九，取它书十之一也”（《文子校勘记》）。王重民《文子校记》、王叔岷《文子斟正》皆称作顾观光《札记》，或顾观光所代作。章太炎也言“今之《文子》半袭《淮南》”（《菴汉三言》）。王叔岷《文子斟正》更是细心爬梳，以具体揭示《文子》是如何抄袭《淮南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一个判断是困难的。葛刚岩同志将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皆输入电脑，对两书相重的部分从词语、句式、篇章变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逐句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对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也一起认真地讨论过。

确实如有的学者所言，也有简本《文子》中的文字错而今本《文子》中正确，或简本中失其义而今本的表达更能体



现全书思想的地方。但全面来看,综合分析,还是今本《文子》抄了《淮南子》,而不是相反。这在书中讲得很充分,这里不必举例。对于简本胜于今本和今本胜于简本的实例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简本中的个别错误是传抄中形成的,因为简本在埋入地下之前也已经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而文意和句式、用词方面今本较简本胜的地方,也有今本又经过后人润饰、修改的因素在内,但今本《文子》中大段大段文字由《淮南子》删并、集约而成的迹象则是不能反过来解释的。当然,确定是今本《文子》抄了《淮南子》,还因为简本《文子》竟没有一点与《淮南子》相重的部分,这也不是以“偶然”二字可以解释得了的。

从书中可以看出葛刚岩对于即使他并不赞成的观点,也予以注意。书中的个别结论也可能只是一种推论或假设,但其中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地方。

据我所知,葛刚岩同志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过转变,其原因也同样是出于对《文子》文本理解、认识的加深以及对简本、今本异同分析的深入。比如他开始时同意李定生先生的看法,认为春秋战国之间有一个文子,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看法,主要由于简本中的“天王”问题在春秋战国这

一段中很难解决。

第二,这本书虽然侧重于文献学的研究,大量的精力用于对一些具体材料的分析、对比和研究,但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中总是考虑到春秋战国至唐代这个漫长时期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大势。他在这段时间读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等哲学史、道教史著作和有关文献学方面的论著,也研读了其他一些道学方面的论著。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可以避免提出的看法局部说来很有道理,而整体上或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中难以成立的情况。

《文子》是一部问题很多、历来学者们看法分歧很大的著作,葛刚岩同志在当代很多学养深厚的学者之后,面对很多矛盾,不畏困难,认真钻研,提出了一些看法,理清了一些问题,完成了这一部书,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有意义的。当然,书中的一些结论只是一家之言,也只是他目前阶段的认识,还需要经过以后研究的检验。但把它发表出来引起大家的进一步的讨论,总比个人孤立地摸索要好。

作者简介:赵逢夫,男,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接第134页)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有时任何语言的描绘都无法企及。”“读图画远比读文字快捷,直观,感受直接,还带有视觉上的审美愉悦。这些都是大众文化的需要。因而有人说大众文化的盛世,必然读图盛行。”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认为:“图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对于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来说,读图文书有利于他们理解并吸收知识。”但是“对于成人而言,图文书中的语言只是一种‘小语言’,不一定能传递有效的知识”。他认为,人们从中获得的知识是不系统、不完整的。也有专家指出读者“过于依赖对画面的‘阅读’,会削弱对文字的阅读能力和想象力”。<sup>[8]</sup>

其实,“读图”的功过与是非是无法一概而论的。任何事物都具备两面性,有利亦有弊。关键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才能使读图乃至阅读真正发挥有益的作用。一是应该强调选择适合自己的读物。选择时要考虑自身的阅读需求,来决定是否选择图文书。在选择图文书时,要考虑图文书的质量,看图与文之间是否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二要注重读图能力的培养。图片是用视觉语言表达的作品,视觉语言是图片表达的一种特有语言。它有着自己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既是一种无国界的交流极其广泛的语言,又是一种能产生丰富多义性的语言。读图者的阅读品位、阅读方式、阅读习惯

以及阅读时间等都会影响图片的阅读效果。所以要培养读图者的读图能力,以正确理解文献的精髓。三要避免快餐式阅读所带来的形式上的阅读、感官上的轻松、表层上的享乐、以及短暂的快感和持续的浮躁,远离功利主义的诱惑和形式主义的羁绊,追求真正的阅读。

参考文献:

- [1]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29.
- [2]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上海:三闲书屋,1937:26.
- [3] 李永华.重温读图时代:古籍雕版插图发展述略[J].图书与情报,2003,(3):23.
- [4] 贾娟.喜忧参半的图文书[J].新闻出版交流,2003,(6):23.
- [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 [6][8] 赵婧.读图“功过与是非”[M].中国图书评论,2005,(1):10.
- [7] 周毅.读图时代“?”[J].出版参考,1995,(5):10.

作者简介:宁圣红(1975-),女,毕业于山东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图书馆工作。

·旧学与新知·

主持人：徐 雁      助理：浦清莲

·书刊林·

## 黄裳书话的文体之美

赵普光

现代书话是一种极富传统意味的文学新体式。从周作人、郑振铎到唐弢、黄裳，现代书话形成了一条潜在的脉流，这一脉流由读书人与书、书与文化相胶结而成。仅就当代致力于书话写作的人而言，就有如黄裳、孙犁、曹聚仁、谢国桢等等。这些人本身就对传统有着更多的眷顾、怀着更浓厚的情结，倾向于文化守成主义，他们所以更多地选择书话写作形式，在于书话中蕴含着读书人对书和书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等无限的牵绊、依恋。在当代的书话创作的脉流中，能够熔铸古今自成新体的，恐怕莫过于黄裳先生的书话了。

黄裳先生的书话创作见于《珠还记幸》《榆下说书》《音尘集》《翠墨集》《春夜随笔》《妆台杂记》《掌上的烟云》、《春回札记》《来燕榭读书记》及黄裳先生本人编选的《黄裳书话》等集子中。纵观黄裳先生的书话作品，显示出了独特的文体之美。

### 一 黄裳书话的札记体式

黄裳先生的书话大多具有较明显的札记体形式。这种札记体式，更多地受到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书目提要、读书笔记等著述方式的影响。黄裳先生不止一次地坦言，自己一向喜欢谈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sup>[1]</sup>这一癖好无形中影响了黄裳写作书话的体式选择。熟悉黄裳作品的人都知道黄裳先生的书话文字不同于堂而皇之的学术文章，往往篇幅不长，即兴所至，点到为止，却时时有真知灼见闪现。如《桃花扇 札记》就是作者在阅读清人别集时，每见到有记《桃花扇》之事的，就信笔记录下，进而敷衍成文。另如《书丛杂拾》两则亦是札记体例的写法。又如《珠还记幸》《榆下说书》等对新文学书籍和旧籍版本的谈论也未能出乎札记体例的范围，典型的还有《来燕榭读书记》，恐怕要算正宗的传统题跋文字了。《断简零篇室摭忆》，从作者书斋的雅号——“断简零篇室”的别致的名字，即

可窥见黄裳书话文字少有系统长篇的宏论，而是多为以短见长的札记体特征，如其中的《关于 玉玲珑》《我写题跋》《漫话藏书》等大都是一两千字的短文，而这短札零篇中却凝炼着书籍、社会、历史、人生的大气象。尤其是《拟 书话》五则更是典型的短篇微制，正如作者在小序中说：“偶然翻阅《晦庵书话》——笔者注），如温旧梦，遂发兴仿弢公笔意，少少记之。因题为《拟 书话》云。”

札记体例构成了黄裳书话作品的主要体制特点，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因为作者有着较为清晰的文体自觉意识。对于何为“书话”，黄裳先生曾用自己特有的形象趣味的语言作了说明：“……每一本书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藏书者看来，其间都有一段书缘。把这书缘记下来的就是书跋或书话，而这正是我所爱读的文字。”<sup>[2]</sup>可见，在黄裳的心里，书话本身就是有异于纯粹的学术写作，而是充满情趣、历史感、抒情性及叙事性的文字。对于自己的书话创作的状态及由此决定的文体选择，黄裳先生十分清醒，他曾在《榆下说书》的后记中夫子自道：“‘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衍成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sup>[3]</sup>黄裳先生所谓“少深度”当然是自谦，但“漫谈”却真正点出了其书话创作时任意作文的自然状态，采用札记体式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 二 黄裳书话的小品化

黄裳书话有着浓重的小品化倾向。黄裳书话的语言恬淡自然，这种散淡化、美学化的语言使之作小品文倾斜，并最终形成黄裳书话的小品化特质。如前所述，黄裳曾自谦地说自己的书话“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其实正是这种“漫谈”，恰恰也决定了其书话的小品化特征。黄裳先生十分重视书话的美感价